

前言

探尋鄧小平

2000年夏我在南韓濟州島。一天，悠閒地用過戶外晚餐後，我心情放鬆地對我的友人、20世紀美國最了不起的東亞事務記者之一唐·奧伯多弗 (Don Oberdorfer) 說，我就要退出教學工作，想寫一本書，幫助美國人瞭解亞洲的重要發展。很多人都說，我在1979年出版的 *Japan as Number One* (《日本第一》) 有助於美國商界和政界的一些領袖對1980年代震撼不少西方人的日本崛起有所準備。那麼，站在21世紀的起點上，做點兒什麼最有益於幫助美國人理解亞洲未來的發展呢？唐在過去半個世紀裏一直進行亞洲事務的報道，他毫不遲疑地說：「你應該寫鄧小平。」思考了幾周後，我斷定他說得對。亞洲最大的問題是中國，而對中國的現代歷程造成最大影響的人是鄧小平。此外，深入分析鄧小平的人生和事業，可以揭示近年來塑造中國社會和經濟發展的基本力量。

寫鄧小平並非易事。1920年代鄧小平在巴黎和上海從事地下工作時，就學會了完全依靠自己的記憶力——他身後沒有留下任何筆記。文革期間批判他的人想搜集他的錯誤紀錄，但沒有找到任何書面證據。為正式會議準備的講話稿均由助手撰寫，有紀錄可查，但其餘大多數談話或會議發言都不需要講稿，因為鄧只靠記憶就能做一個小時甚至更長時間條理分明的講話。此外，就像黨的其他高層領導人一樣，鄧小平嚴守黨紀。即使在文革期間和妻子兒女下放江西時，他也從來不跟他們談論黨內高層的事，儘管他們也是黨員。

鄧小平批評那些自吹自擂的自傳。他沒有寫自傳，並且堅持別人對他的任何評價都「不能誇大，不能太高」。¹事實上，鄧很少在公開場合回憶過去的經歷。人們都知道他「不愛說話」，出言謹慎。因此，相比於通常情況下研究某位國家領導人，寫鄧小平和他的時代，是一項更不尋常的挑戰。

遺憾的是，我從來無緣與鄧小平本人會面並交談。1973年5月，我作為美國國家科學院贊助的代表團成員初次去北京訪問時，見過周恩來和其他一些高官，但沒有見到鄧小平。那次訪問給我留下的最強烈印象之一是，鄧小平剛剛結束了文革下放到北京，高層內部正對此事議論紛紛，對於他將擔任某種重要角色並帶來重大變化抱有很高的預期。擔任什麼角色？帶來哪些變化？我們西方人都在猜測，但誰也沒有預料到後來20年中國行將發生的巨變，以及中國的未來會在多大程度上被這位非凡領導人的努力所推進。

我最接近鄧小平的一次，是1979年1月在華盛頓美國國家美術館的招待會上，當時我離他只有幾步之遙。這個招待會是一次盛大的集會，來自政界、媒體、學界和商界的美國中國問題專家齊聚一堂，慶賀美中兩國正式建交。我們參加招待會的很多人已相識多年，過去常在香港見面——當中國對大多數西方人緊閉大門時，香港是中國觀察家聚會的重要地點，在那裏我們分享最新消息或傳言，力圖穿透竹幕。而我們中一些人已久未謀面，於是熱切地攀談敘舊。此外，舉行招待會的國家美術館的音響效果十分糟糕，不是個適合演講的地方，從擴音器中完全聽不清鄧小平和譯員在說些什麼。於是我們這群聚在一起的中國觀察家同行朋友繼續著自己的交談。據接近鄧小平的人說，這群嘖嘖喳喳、心不在焉的人令他懊惱。然而他給我們大多數在場的人的印象，是他如何像對著一群正襟危坐洗耳恭聽的中國聽眾一樣唸著講稿。

因此，我要瞭解鄧小平，就像一個歷史學家要去瞭解自己的研究主題一樣，只能通過研讀文字材料。而關於鄧小平一生的不同方面存在著多種不同的紀事。儘管鄧小平告誡寫作者不要吹捧，但在官方或半官方歷史寫作中，褒揚英雄、貶抑他人的傳統在中國依然流行。由於另一些官員也會有秘書或家人寫一些溢美的文字，細心的讀者便可

以對這些不同的紀錄進行比較。黨史專家中也有一些出於職業責任感而秉筆直書的人。

隨著更多黨內檔案的公開，未來將有更多寫鄧小平的書。但我相信，對研究鄧小平的學者而言，沒有比現在更好的寫作時間。很多基本的年譜資料已被整理和發表，大量回憶錄已出版，況且我還有一個以後的歷史學家無法再有的機會：我得以跟鄧小平的家人、同事以及這些同事的家人會面交談，他們為我提供了一些未必能從文字材料中獲得的見解和細節。過去幾年中，我總共花了大約12個月的時間在中國、用中文採訪了那些瞭解鄧小平及其時代的人。

就研究鄧小平事蹟的客觀紀錄而言，最基本的一部文獻是《鄧小平年譜》：2004年先出版了兩卷，共計1,383頁，從官方角度記錄鄧小平從1975年直到1997年去世前幾乎每一天的活動；2009年又出版了三卷，共計2,079頁，記述1904年到1974年鄧小平的生平。由黨史學者組成的編寫這部年譜的班子可以接觸到大量黨內檔案，並力求做到記錄準確。年譜不提供解釋，不進行褒貶，不作揣測，沒有涉及一些最敏感的主題，也不提政治鬥爭。不過，它對於確定鄧小平曾在何時跟何人會談，以及在很多情況下他們之間說了些什麼，都大有幫助。

鄧小平的很多重要講話經過編纂整理後，收入了官方的《鄧小平文選》。這部三卷本的著作提供了關於鄧的很多重大政策的有用紀錄，儘管，極為關鍵的是，仍需要參照當時國內和國際事件的大背景對之作出詮釋。有關陳雲、葉劍英和周恩來的重要講話和文章的編年資料同樣很有幫助。

最有助於深入理解鄧小平個人思想的著作，是鄧小平的小女兒鄧榕（毛毛）所寫的有關復出之前的鄧小平的兩部書。它們是根據她的個人回憶，她對瞭解鄧小平的人的採訪，以及中共檔案寫成的。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鄧小平的健康狀況每況愈下，鄧榕一般都會陪同父親外出。儘管鄧小平不跟家人談論高層政治，但家人既熟悉他本人，又瞭解國家形勢，所以足以領會和理解他關切的問題和考慮問題的方法，其中有些東西也只有他們看得到。其中《我的父親鄧小平》講述了1949年以前鄧小平

的經歷，另一部《鄧小平：文革歲月》記述的是1969年至1973年間她陪同父母從北京下放到江西省的歲月。她在書中明顯表露出對父親的感情和崇敬，描繪了一個十分正面的人物形象，但是她也講述了很多細節，揭示了不少鄧小平的品格和態度。事實上，考慮到黨的政策限制，以及她要描繪一個正面形象的努力，她已經是驚人地坦白、開放和具體了。她在寫這些書時得到了黨史學者的協助，由他們核對日期、人名和事件。她的寫作仍在繼續，正在寫建國初期鄧小平的活動，但還未寫到1973年之後仍很有爭議的時期。她慨然同意接受我的幾次長時間採訪，對她所寫的內容進行補充說明。

在我扎進大量中文文獻之前，有些英文著作為我研究鄧小平時代提供了很好的起點，但除了孫萬國和弗利德里克·泰偉斯 (Frederick Teiwes) 的著作外，它們大多撰寫於為紀念鄧小平百歲誕辰而出版的年譜和回憶文字面世之前。以下作者的著作令我格外受益：鮑瑞嘉 (Richard Baum)、理查德·伊文思 (Richard Evans)、傅士卓 (Joseph Fewsmith)、梅勒·谷梅 (Merle Goldman)、馬若德 (麥克法夸爾) (Roderick MacFarquhar) 和沈邁克 (Michael Schoenhals)、莫里斯·邁斯納 (馬思樂) (Maurice Meisner)、錢其琛、陸伯彬 (Robert Ross)、阮銘、哈里森·索爾茲伯里 (Harrison Salisbury)、泰偉斯、孫萬國和于光遠。

理查德·伊文思大使是一位聰明幹練的英國外交官，1984年至1988年任英國駐華大使。他根據自己和鄧小平的會談以及英國政府文件，寫了 *Deng Xiaoping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①。此書主要涉及鄧小平在1973年以前的經歷，為受過良好教育的讀者提供了一個文筆極佳的概述。在西方的政治學者中間，鮑瑞嘉對鄧小平時代的政治做了最為細緻的研究，寫成 *Burying Mao* (《埋葬毛澤東》) 一書。他利用了1994年其著作出版之前可見的中國資料和香港分析家的著作。他慎重使用了香港的報道，我則極少使用，因為很難核實它們的信息來源，故而很難評價其

① 中文版為理查德·伊文思著 (武市紅等譯)：《鄧小平傳》(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中文版編者註

可靠性。莫里斯·邁斯納（馬思樂）是一位很有思想、熟諳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者，他的 *The Deng Xiaoping Era*（《鄧小平時代》），以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問題作為背景研究了鄧小平。我在費正清研究中心長期共事的同事梅勒·谷梅在她的 *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Political Reform in the Deng Xiaoping Era*（《在中國播種民主：鄧小平時代的政治改革》）一書中，回顧了鄧小平時代不斷變化的思想潮流。她利用的材料不僅有出版物，還有她跟書中所記的許多知識分子、尤其是持不同政見者的交談。*Deng Xiaoping: Chronicle of an Empire*^②的作者阮銘在1983年被黨內保守派清除出黨之前是中央黨校的研究人員。他流亡美國後，激烈批評了那些拖改革後腿的保守派意識形態宣傳家。

Ten Episodes in China's Diplomacy^③的作者錢其琛，在鄧小平時代的大多數時間擔任外交部長和副總理，他的著作對這個時期的外交政策做了中肯的、信息豐富的紀錄。幫鄧小平起草過三中全會講話稿的于光遠，在 *Deng Xiaoping Shakes the World*^④一書中講述了這個歷史轉折點。由於我參與過這兩本書的英譯本編輯工作，所以有機會同這兩位和鄧有密切工作關係的前官員進行補充性討論。

已故的哈里森·索爾茲伯里是一位記者，也是 *The New Emperors: China in the Era of Mao and Deng*（《新皇帝：毛鄧時代的中國》）的作者。毛澤東去世不久後他有機會見到中國的幾位主要領導人。雖然他的一些描述——例如鄧小平和三線工業的關係——顯示出嚴重誤解，但他較其他記者而言接觸到更多材料，並且講述了當時人所不知的新鮮觀點。

沈大偉（David Shambaugh）在鄧小平上台時擔任 *The China Quarterly*（《中國季刊》）的主編，1992年鄧小平退出權力舞台不久後，他召集一些

② 中文版為阮銘著：《鄧小平帝國》（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2）。——中文版編者註

③ 中文版為錢其琛著：《外交十記》（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中文版編者註

④ 中文版為于光遠著：《1978：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台前幕後》（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中文版編者註

學者對鄧小平及其時代進行評價，並把這些評價文章收入了他編的 *Deng Xiaoping* (《鄧小平》) 一書。

泰偉斯和孫萬國為寫作他們的三卷本著作，較之所有西方學者掌握了更多1974年至1982年這個時期的中文文獻。他們出版的第一卷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毛時代的終結》)) 的時間跨度是1974年到1976年。他們仔細評估關於各種事件的不同解釋，旨在以極為細緻的方式釐清基本事實。孫萬國在過去20年裏致力於探究這個時期的每一個重要事實，其堅持不懈超過了我所認識的其他任何人。後來他還花了兩個多月的時間核對我手稿的不同版本，修正錯誤、建議補充說明及推薦關鍵性著作。

博士卓所著 *The Dilemmas of Reform in China* (《中國改革的困境》) 是有關這個時期經濟論戰的最好的英文著作。陸伯彬寫了幾本研究這個時期外交關係的傑作。窮數十年之力研究中國精英政治和文革的馬若德 (麥克法夸爾)，撰寫過三卷本的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⑤，並與沈邁克合著講述文革史的 *Mao's Last Revolution*^⑥。我認識所有這些作者，並就鄧小平及其時代與他們進行過交談。他們總是慷慨地對我補充他們書中所述，使我對其中涉及的一些重要問題有了更清晰的認識。

已經面世的中文資料浩如煙海，即使最傑出的中國學者也無法全部閱讀。從1990年代開始，又可以從中文互聯網上獲得爆炸般增長的信息。我一直得到許多研究助理的協助，其中尤其應當提到任意和竇新元。任意的祖父是前廣東省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一位了不起的廣東改革派領導人。竇新元曾在廣東省經委工作多年，他既有個人經驗，又具備學者從歷史文獻中探知真相的毅力。任意和竇新元兩人都花了一年以上的時間幫我搜集大量材料，並力求深入理解不同立場的中國人的感受

⑤ 中文版為馬若德 (麥克法夸爾) 著 (魏海平、艾平等譯)：《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兩卷本 (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同書另有北京：求實出版社1989-1990年本。——中文版編者註

⑥ 中文版為馬若德 (麥克法夸爾)、沈邁克著 (關心譯，唐少杰校)：《毛澤東最後的革命》 (香港：星克爾，2009)。——中文版編者註

和行為。姚監復曾是趙紫陽領導下的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的官員，也花了數周時間閱讀我手稿中有關經濟的章節。

中文互聯網是查詢人名和日期這類問題的難得的信息源，但除此之外，往往很難區分哪些是事實，哪些是臆想或趣聞。如果互聯網上的一些文章提供了重要信息但沒有註明來源，我會盡量核查原始出處，或至少在採用前將之與另一些資料進行比較。這樣做時，我發現China Vitae是一個有關在世的中國官員的十分有用的英文網站。

和鄧小平一起工作過的官員所寫的回憶文章可謂汗牛充棟。三卷本的《回憶鄧小平》是這類文獻中最好的文集之一，類似的文集還有三卷本的《鄧小平人生紀實》。《炎黃春秋》和《百年潮》這兩本出色的雜誌發表了很多與鄧小平一起工作過的人撰寫的文章。《炎黃春秋》是由既瞭解內情又有改革意識的前任高官主辦的刊物。從保守派官員鄧力群所寫、出版於香港的《十二個春秋（1975–1987）》，以及他在當代中國研究所——這個由他建立的研究所，為很多研究建國後重大事件的歷史著作提供了條件——的未發表的講話中，可以看到另一種觀點。

還有很多有關這個時期的所有關鍵人物——包括陳雲、谷牧、胡耀邦、萬里、葉劍英和趙紫陽——的文獻，往往是出自優秀的記者之手，他們提供了各不相同的視角。最出色的記者所寫的有關鄧小平的著作是楊繼繩的《鄧小平時代：中國改革開放二十年紀實》。官方歷史如《陳雲傳》，雖經過精心編輯，仍是以文獻資料為基礎。朱佳木談陳雲的書（朱佳木、遲愛萍、趙士剛著：《陳雲》）雖然簡略，卻得益於他為陳雲當過五年助手的經歷和他本人的細心研究。除了《鄧小平年譜》外，還有一些官方為陳雲、周恩來、葉劍英以及其他一些與鄧小平有密切工作關係的高官編訂的年譜。

另一部極有價值的文獻，是有關1949年後中國歷史的十卷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簡稱《國史》）。該書已出版七卷，仍有三卷待刊，由中國大陸的學者撰寫，包括高華（已故）、陳東林、韓鋼、沈志華、蕭冬連等人。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由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出版，為這個時期客觀全面的學術研究樹立了新的標準。

雖然中國政府已大大放寬了人們的寫作空間，但大陸一些知情的局內人所寫的東西仍被認為爭議太大，無法在大陸出版。香港的出版業則更加開放，因此很多這類著作在香港出版。其中信息最豐富的是鄧力群、胡績偉、楊繼繩、趙紫陽和宗鳳鳴的著作。在寫過回憶錄的改革派官員中，有《人民日報》前總編胡績偉，他寫了《從華國鋒下台到胡耀邦下台》一書。

中國大陸沒有出版胡耀邦的年譜，但他大陸的朋友在香港出版了兩部篇幅浩大的年譜，一部是盛平編的《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另一部是鄭仲兵編的《胡耀邦年譜資料長編》。還有張黎群等人所寫的三卷本《胡耀邦傳》，其中二、三卷迄今仍未出版。胡耀邦的朋友彙編了四卷本文集《懷念耀邦》，編者為張黎群等，在香港出版。在大陸方面，胡耀邦的女兒用「滿妹」的筆名發表了《思念依然無盡：回憶父親胡耀邦》。

趙紫陽1989年後被軟禁在家期間，設法記錄下他的個人經歷和觀點，並被譯成英文以 *Prisoner of the State: The Secret Journal of Premier Zhao Ziyang*^⑦ 為書名出版，編者是鮑樸、蔣悅磊 (Renee Chiang) 和殷阿笛 (Adi Ignatius)。1989年之後，趙紫陽與之交談時間最長的局外人是宗鳳鳴，他寫了《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一書。趙紫陽並未授權宗鳳鳴寫下這些回憶，但他授權出版並親自審閱了與記者楊繼繩進行的三次主題集中的談話紀錄，該紀錄發表在《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一書中。這些著作包含對鄧小平一些做法的嚴厲批評，提供了有別於大陸出版文獻的富有價值的視角。

我還觀看過記錄鄧小平的講話、會見、出訪以及與家人休閒的紀錄片。我的研究助理還應我要求翻譯了一些俄文文獻。

除了上述有關鄧小平時代的一般性著作，我還使用了很多與本書某些特定問題相關的專業文獻（見註釋及英文、中文和日本文獻的線上目錄 <http://scholar.harvard.edu/ezravogel>）。

⑦ 香港版為《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9），臺灣版為《國家的囚徒》（臺北：時報出版，2009）。——中文版編者註